

声音里的延安： 文化抗战中的延安演说

演说,是指在公众场合,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进行宣传鼓动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其在晚清就渐趋风行。1902年,创办于天津的著名日报《大公报》刊载《说演说》,将演说与译书、刊报并列为开启民智的三大利器之一。因此,重返延安演说的现场,不仅能领略历史褶皱里的风貌神采,还可看出“演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最辛苦的演说家与最当红的演说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和“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的组织政策,使得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蜂拥而至。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万多名青年从该处获批去延安。这还不包括从陕西三原、宝鸡、甘肃陇东、山西临汾等其他路径进入陕北的人。

知识青年汇集延安,自然都希望听听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中共对于参差不齐的各地学生,也有意将对他们的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广场。毛泽东无疑是最受欢迎、也最辛苦的“演说家”。他经常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摆一个小桌子,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新招的学生演说。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抗战形势:为什么只能选择持久战,为什么当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我们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毛泽东讲话善用比喻,常将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席地而坐的学生们听到高兴处就鼓掌,听到谐趣处就大笑,也不觉得累。学生笑,毛泽东自己也跟着笑,讲完后还回围着他的学生边走边聊,也不急着骑马返回。

当然,毛泽东的演说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杨森部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残忍杀害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平江惨案”遇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即席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讲(该演讲后来整理成文,更名为《必须制裁反

动派》,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据曾任过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的王仲方回忆,他从来没见过毛泽东发那样大的脾气。他在晚饭后挥舞着手势,大声斥责国民党的罪行。听众们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因为陕北昼夜温差大,有些初来乍到的外地学生边听边跺脚取暖。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许光达正主持会议,见他跺脚的学生保持安静。毛泽东反倒体谅学生:“天这么冷,为什么不跺脚!”他这样一说,大家反而安静了。但要说边区一度最当红的演说家,则非王明莫属。1937年年底才从苏联飞回延安的“钦差大臣”王明,经常受邀到各机关团体演说。他只有一米五几,酷爱苏式打扮,常身着皮夹克配高筒皮靴,但人有激情又辩才,演讲时常让警卫员在讲台上放一摞马列原著,边翻边讲。王明对马列经典段落和共产国际会议决议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口直译,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一度很受青年追捧。和王明一起回来的康生,也爱穿苏式服装,刚到延安时大讲反对托派,他那句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口头禅:“同志们,你们不要听托洛茨基那个——驴叫!”常被学生拿到晚会上作模仿秀。同为“留苏派”的博古,演说时则严肃正经,一口上海普通话有板有眼。

演说现场的无名英雄

一场精彩的演说就是一席丰盛的精神盛宴,讲者舒心,听者快意。延安时期的许多演讲后来传诵一时,如老辈人耳熟能详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但一场演说是如何变成一篇鸿文呢?这就不能不提

演说现场的那些无名英雄——速记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并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无速记人员。战争年代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千头万绪,领导人讲话很少专门拟稿,往往只有一个提纲。如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风报告,提纲就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其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著名演讲《反对党八股》,提纲也仅两页纸,上列八个标题。如果没有速记,事后就只能请演讲人另写。毛的速记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后,从延安开始的。

1938年4月,在中宣部的主持下,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在延安成立。唯一的教员张霁中,是黑龙江省安达县人,1936年6月毕业于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1937年到延安(改名石磊)。他在填写来延人员登记表时,是即兴发挥。其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著名演讲《反对党八股》,提纲也仅两页纸,上列八个标题。如果没有速记,事后就只能请演讲人另写。毛的速记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后,从延安开始的。

速记工作一般分四类:第一类是记录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讲话,除前面所提毛泽东的部分文章外,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都是根据当时的速记稿整理出来的。第二类是记录各种中小型会议;第三类是协助中央领导起草文稿、讲话,即领导口述,速记人员记录,如任弼时口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的决议》(第一篇)等;第四类是记录中央领导人接见干部或客人时的谈话,如毛泽东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出自此次谈话,并随该文远销国内外)等。

速记工作默默无闻又异常辛苦。中央密集地召开重要会议时,与会者往往乡音各异,又是自由发言。速记人员对有的方言听不太懂,又不熟悉发言人所说的属地情况,记录下来难度极大。而且很多记录符号仅记录人当时能识辨,需要迅速将其译为文字。一般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工作十分紧张。中央对速记员要求很严,但在政策待遇上则对他们关爱有加。速记员若是晚上加班,必定安排夜宵。边区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他们每人每月另发六斤小米津贴,形势好转了就改发猪肉津贴。

中央领导人也很厚爱这批无名英雄。贺龙曾为速记员的棉鞋特批过条子,刘少奇亲自给速记员送过西瓜。至于毛泽东,经常交代李富春,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泽东本人作完报告,还常把做速记的年轻人拉上他的车,开到合作社请他们吃一顿。有时候开完会有供应的伙食,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那份菜分给速记员。后来速记员们一见面毛泽东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又给他们夹菜。

正是速记员的无私奉献,才使演说时的吉光片羽最终化为完整的鸿篇巨制。他们胸怀大志但甘做小兵,用一支铅笔一片丹心,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中国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

□冉恩尧

往事



在西安市未央有六百年以上历史的村落可谓凤毛麟角,因为未央大地曾是秦汉首都在此,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官殿、武库、军营、漕运、上林苑占去了。明朝大移民后,这里才有了村村寨寨。今儿就讲述未央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村落,这就是汉城街道的郭家村。

我在汉城街道办工作十余年,走进神秘的郭家村有三不解,一是该村为什么没有姓郭的?二是为什么又叫“郭家村”?三是村门上匾额“汉都当户”是谁人所题?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考证研究,理出了一些头

千年之村——郭家村

绪。1998年汉城乡的郭家村,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走在前列的先进村,也是全区的纳税大户。就在这时我走进了郭家村,进行工作调研和了解立村情况,见到了书记侯吉利、副书记周爱琴和村上有学识的长者,问:“郭家村为什么没有姓郭的?全村侯、周、张、苏、王姓占多数,就连娶的媳妇里面都没有姓郭的。”他们告诉我,这个村以前不叫郭家村,叫“瓜村”。“瓜村”就是“瓜(傻)子村”,村里人觉得这个村名难听,有学识的长者们根据陕西方言“瓜村”的谐音推成了“郭家村”。这个“瓜村”不仅为我解开了两个谜团,还为弄清郭家村的立村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史记·萧相国世家》有一段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瓜”又称“青门瓜”。《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载:“长安城东出南头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谓种瓜青门外。”又据史书记载,东陵侯邵平与萧何交谊深笃,萧何遇事每每向他请教,萧何在营建

汉都长安城时,让邵平居住在长安城东的青门亭。《类编长安志》“亭”中有“青门亭,去都城十三里,在故城东门之外,即邵平种瓜之处。”邵平所种的甜瓜汁多味美,在长安颇有名气,历代多为文人们称颂。著名诗人阮籍,在其《咏怀诗》中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畹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阮籍在这首诗中将邵平当年种瓜卖瓜的盛况描述得十分详尽,其中“连畹距阡陌”,可以想象当年种植面积之大。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206年就有这个种瓜的村落,民间俗称“瓜村”。郭家村的位置也正好与“从未央宫向东出霸城门十三里”的记载相符合。据历史记载推断,今天的郭家村就是当年的“瓜村”。

1990年,正值郭家村的经济如火如茶之时,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在新村落成之日,请易俗社的书法家刘冬生,在新村门楼上,写了一块硕大的金字牌匾“汉都当户”。我问起“汉都当户”是哪位历史名人题的?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说:“我小时候听我爷说,‘汉都当户’是瓜村庙里爷像上边挂的牌匾,庙门上的砖雕匾额上写的就是‘汉都当

户””。据题字和记载得出,“汉都当户”其含义有三。其一是指“瓜村”地理位置,与汉都长安城的霸城门是对门,是门当户对的;其二,邵平种瓜以及为汉而谋的风范,对汉王朝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配得上是“汉都当户”;其三邵平从侯爵沦为布衣,安心于瓜田,被后世称为贤人,这个“汉都当户”他当之无愧!当地老百姓相传,邵平亡后就葬于“瓜村”附近,且有封土,即大家,人都把该家叫“瓜王家”。此家规模巨大,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将其夷为农田。

以上所述初步证明:历史上的“瓜村”就是今天的“郭家村”。据《咸宁县志·隐逸传》记载,邵平最早在此地种瓜卖瓜始于公元前207年,而西汉始于公元前206年,也就是说,自西汉初就有了这个村落,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据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公元八年,王莽篡权,赤眉军起义,西汉灭亡,长安城生灵涂炭。邵氏子孙迁回封地秦东陵(今临潼区韩峪乡秦东陵)及邵平店(今灞桥区灞桥街道邵平店村)繁衍生息。今天郭家村里的侯、周、张、苏、王姓与今临潼区韩峪乡秦东陵的邵氏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丹

秦味

麟游人向来朴实厚道,极重视待客之礼,每有亲朋好友来访,必要留你吃一顿正宗的血条面。

地域特点成就了血条面的独特风味。时至今日,它只流传并风行于麟游地区,与许多古老美食一样,血条面也有着一段悠久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来麟游九成宫避暑,去乡间视察民情时,偶然发现血条面并青睐有加,才使得这道美味名声大噪,传承不衰。

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麟游人必做血条面,且家家户户都会做。面好吃,制作过程自然复杂。血条面,顾名思义,自然离不开血。山里巧厨麻利又能干,将新鲜温热的猪血加盐后反复搅拌,使血不再凝固,手法力道均来自长年累月练就的那一套不为外人轻易掌握的经验。接着,扯过干净的细纱网轻轻过滤,去除掉残留的杂质,至于猪血兑水的标准,无须上秤称量,分寸全在心中。

瓦盆里的精细麦面粉要用水来揉拌,这也是考量手艺至关重要的环节,面揉得软硬程度、色泽浓淡如何,皆在一念之间。红色的面团团上一两个钟头后,精彩一幕便要上演了:只见手执擀杖者快速而熟练地将一坨面推擀开来,且平展又均匀;提前准备好的猪油涂抹在面团上,既防止粘连,又平添柔韧。此刻,面的红,油的亮,交相映衬,让人不禁连连

赞叹,看着都这么美,吃起来哪有不香的道理?

这时,将面卷成四五公分宽的条状,早就候在一旁的大刀利落精准地落下,一簇簇细面便堆在案板上了。这时帮忙的人会小心翼翼地托起来,整整齐齐摆放在蒸笼的篾子上,两层之间刷一遍猪油,架起旺火烧锅,十几分钟后,灶膛内热气腾腾,香味袅袅,时间估算着差不多了,揭开笼盖,煮熟的血条面就算“粉墨登场”了。

按捺不住诱惑的孩子们凑上来,叫嚷着要啜一碗干拌血条面,那可是温热血美的头一锅哟!娃们吃得嘴角流油,大人看得垂涎欲滴。

血条面地道不地道,浇汤颇为关键。“薄劲香、煎稀汪”是形容血条面的特点,前半句是概括面的特征,后半句则是对汤的要求。“煎”是指汤要煎和,汤温得高;“稀”是强调面少汤宽,容易入味,也就是人们平日所讲的“味道足在汤里”;“汪”就是极画面面,臊子要量足,肉丁不可或缺,有经验的师傅只需一勺上去,就能呈现一碗精彩:浓液而不腥,色红



而不辣,油厚而不腻。一般浇汤里,常取胡萝卜之红、豆角之绿、木耳之黑、豆腐之白,均切成小丁,炒成底菜,有些嫌麻烦的细致人家,还会备一小块凉粉,也切成小方丁,余进底菜里,热热闹闹,爽滑清滑,更添一份口感上的情趣。漂菜则会将鸡蛋摊成薄片,切成菱形片,取蒜苗或韭菜少许切细,待捞面后,舀汤之前洒上,华丽尽

香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大唐时期,社会开放包容,对外贸易繁荣,异域香料源源不断输入我国,推动了用香风尚的盛行。

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香具20余件,是我国唐代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种类最繁、等级最高的香事用具集群性发现,对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对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及鎏金双凤纹五足朵带银炉台出土于法门寺地宫后室,是我国首次发现,且最大、最重要的香炉及炉台组合出土的熏香器。

地宫门开 袅袅飘香

古老地宫重现天地,辉煌光景尽现眼前。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香器、丝织品、瓷器、琉璃器等各类珍宝2499件。出土文物等级之高、品类之繁、数量之多、记载之清晰、保存之完好,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香具,真实全面地再现了唐代宫廷的香事生活。在地宫后室发现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及鎏金双凤纹五足朵带银炉台因体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工艺之精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钣金成型,高29.5厘米,重6408克,通体鎏金,由炉盖、炉身组成。炉盖顶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蕾,便于香味散发。炉盖面有五朵盛开的小莲花,每朵莲花上刻一只口衔瑞草的小鸟,形象生动。卧龟莲花纹有吉祥长寿的寓意。盖沿下折与炉身扣合。炉身为直口,平折沿、方唇、深腹、平底,壁饰流云纹,铆接五趾独角天龙兽足,足浇铸而成并有四趾。香炉底部铭文记载,铸造的时间为“咸通十年”。

炉台直径43.5厘米,高21厘米,重8970克,侈口,浅腹,平底,五瓣葵口,底部装饰双凤衔瑞草,下面的五足朵带与炉身五足朵带相似。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及炉台。

鎏金香具 巧夺天工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香具还有鎏金银龟盒、鎏金带盖莲花纹香炉、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长柄银手炉等。这些精巧华美的香具,彰显出浓郁的大唐气息,香气缭绕中,一个王朝的鼎盛与奢华清晰可见。

查阅已出土的唐代金银香炉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唐代金银香炉的工艺极为考究。由于金银材质贵重,且多用于宫廷,唐代对金银器制作者的要求极高。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代工人学习金银加工工艺至少需要4年时间,足见标准之高、要求之严。唐代金银器盛行,光是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就多达十几种,用于制作金银香炉的工艺一般有范铸、锤揲、篆刻、鎏金、铆接等。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是典型的唐代金银香炉锤揲技术代表。香炉通体圆滑光亮,精美轻巧,从中可以看出制作者娴熟的锤揲技术和美学修养。

唐代的锤揲工艺由两部分源头组成,一种是继承前朝的技术,还有一种是吸收波斯、西亚等地的锤揲技术。在唐代,锤揲技术已经成为制作金银器的主要方式之一。最早使用范铸技术制造出的金银器厚,生产成本过高。在用锤揲技术制作金银器后,成本得以大大降低。锤揲出的金银器平整光滑,工艺美学凸显。锤揲技术不仅可以使金银块锤出设计好的形状,还可以通过锤揲力度和手法的控制,锤出不同的装饰纹样,如一些金银器的卷曲花边。通过巧妙地锤揲,单调的金银器身变得华丽、丰富和精致。

此外,鎏金双凤纹五足朵带银炉台表层的花纹使用了一种篆刻技术。在器物锤揲成型之后,需用篆刻技术对其装饰,用大小不同的錐刀在金银器物表面刻出装饰性的花纹。篆刻技术主要用于金银器物的装饰及细节处理,有三种方式,一是平面篆刻,二是篆刻浮雕样式,三是镂空。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炉台台面的双凤纹便是平面篆刻而成,即在金银器表面雕刻出事先设计好的装饰纹样,通过对篆刻力度的把握,让整个香炉金属表面单一的色彩富于变化,产生明暗与颜色对比,丰富装饰层次。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上的卧龟莲花纹则是相对复杂的浮雕样式,需要里外两面同时进行篆刻,让原本平整的金属表面呈现出凹凸有致的装饰效果。因此,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虽体积小,但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可见其工艺之精湛、制作之精良。

绚丽富贵 大唐风华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冉万里介绍,香炉作为熏香器,在中国汉晋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出土,多称为博山炉、熏香器等。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香炉作为一种重要的用具,与佛事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北朝时期,香炉基本上保持了汉代的传统,多呈博山炉式,开始出现带柄香炉。到了唐代,香炉的造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多样化、造型精美、装饰华丽,造型和装饰都达到了中国古代香炉制造的顶峰。

香供奉的习俗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后,在保持原意义基础上,更注重借助香炉烘托气氛,以达到身心俱静的效果。唐代金银香炉是趋吉避凶、祈福求吉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焚香是祈福的行为;另一方面,金银香炉上的装饰图案也带有祈福纳吉的象征意义,表达了香炉使用者吉祥如意的心愿。

唐代的金属香炉造型主要分为无盖的敞口香炉和有盖的熏香炉。敞口香炉以长柄香炉和无盖的多足香炉为主,熏香炉则主要为博山炉、豆式香炉、多足香炉、兽形香炉、球形香炉。唐代香炉纹饰题材丰富,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装饰华丽,可分为植物纹、动物纹、抽象纹饰。其中植物纹多饰于球形熏香炉上,动物纹常用于兽形香炉、博山炉,辅助植物结合的纹饰多用于装饰多足香炉,抽象纹饰常作为辅助图形装点于炉盖及炉身中。

莲花、卷草等植物纹样与狮、龙、凤、雁等动物形象以及祥云、如意等抽象纹饰,均活跃在唐代香炉装饰中。唐人追求绚丽、华彩、富贵的生活情趣,香炉装饰也是尚美、开放、兼容的社会风尚的视觉化表达。□师念

袅袅一炉香，大唐“氛围”来

鉴赏